

吕叔湘

大家小集
吕叔湘集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大家小集

吕叔湘集

吕叔湘 著

口

卞达夫 编注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叔湘集 / 吕叔湘著; 吕霞, 邝达夫编注.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0

(大家小集)

ISBN 978 - 7 - 5360 - 5462 - 2

I. 吕... II. ①吕... ②吕... ③邝... III. ①吕叔湘
(1904 ~ 1998) —文集②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H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2994 号

丛书策划: 肖建国 秦 颖

责任编辑: 秦 颖 黎 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375 5 插页

字 数 240, 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吕叔湘先生是个语言学家，有很多专著，主要有《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汉语之法论文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合著）、《近代汉语指代词》等等。

他还做过多年教员，编过教材，当过刊物编辑，编纂过词典，翻译过外国作品，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很关心，所以除语言学专著之外，在普及语文知识、改进语文教学、翻译工作、文字改革、改进文风等方面他也有不少论述。

考虑到以研究语言学为专业的读者需要的时候会去查找吕叔湘的专著，而这本《小集》的读者可能是对语言文字方面的事情有一定兴趣，愿意阅读这方面的文章，增广见闻，所以《小集》没有收专著，而是收了有关语文知识、语文教学、中外文对比、古籍整理、翻译工作等方面的著作。

吕叔湘在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视结合实际，他随时随地地从人们的口语中，报纸、刊物、电影、电视的语言文字中发现问题，收集事例，提出看法。他还有一个原则：“我写文章总是谨守一个原则，尽量让读者容易看懂，愿意看下去；

一个人多费点劲可以省得许多人费劲。除此之外，在题目性质允许的条件下，我总想把文章写得生动些，不让读者感到沉闷。”

《小集》里收的虽然是普及性的著作，但是深入浅出，作者是很下功夫的。

1987年吕叔湘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请，编了一本自选集，他在序言里说：“如果这本选集能够让不同嗜好的读者都能在里面找到几篇他能够欣赏的文章，而其余的也不让他皱眉头，我就喜出望外了。”

我们编这本《小集》也抱着这样的愿望。

吕 霞 邴达夫

2008年5月

序 \ 1

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 1

歧义的形成和消除 17

声、韵、调 34

字、词、句 45

意内言外 57

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知识 69

笑话里的语言学 83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93

比较汉英词义 110

翻译工作和“杂学” 115

“夫人”及其他 121

由“rose”译为“玫瑰”引起的感想 125

《中诗英译比录》序 128

赫胥黎和救世军 153

葛德文其人 167

霍理斯论塔布及其他 174

李尔和他的谐趣诗 185

《书太多了》 196

编辑的修养 204

《资治通鉴》标点斟例 213

莫须有 259

结 果 263

掉个过儿还是一样 266

好不…… 268

中性词与褒贬义 270

有“大”无“小”和有“小”无“大” 272

文学和语言的关系 275

典故的形式 279

背景知识 281

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 284

“吾”是“我”，“我”是谁？ 287

绿帽子的来源和产地 289

“他(她、它)”到哪里去了？ 292

多事和省事 295

“人际”和“人与人之间” 297

张恨水的幽默 299

髮生、並甫、當寧、凡鳥 300

吕叔湘年表 303

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

一 引言

1985 年的新年到了，我想借这万象更新的日子跟青年同志们谈谈当前的语文问题。语文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指人们使用语文的能力有所不足，或者指人们在使用语文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前者是语文教学的问题，后者是语文本身的问题。

语言文字在人们生活里的重要性在增加，学习和使用语言文字中出现的问题也就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文字。不断地听到埋怨的声音：父母埋怨子女写不好家信，教授埋怨学生写不好论文，局长埋怨秘书写不好文件，等等。念错字、写错字，包括乱造简化字，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说话方面也不是没有问题。开会发言，啰啰唆唆，冗长而不得要领，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方言土语听不懂，也常常遇到。这些都是问题。所以会有这些问题，一半是由于语文教学——其中

自然也包括说话教学和普通话教学——效率差，教得不认真，学得不认真，教得不得法，学得不得法，可是还有一半是由于语文本身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今天不谈语文教学方面的问题，只谈语文本身的问题，先从汉语文的特点谈起。

二 汉语和汉字

语言和文字是两样东西，又是一样东西，是一样东西，又是两样东西。从历史发展上看，先有语言，后有文字。世界上的语言有几千种，有文字的不过一二百种，有些文字造是造出来了，却没有广泛使用。语言用声音传达人们的意思的，在无法用声音传达的场合，人们就用形象也就是文字来代表声音。最早的文字有直接表示意思的，就汉字说，就是所谓“六书”里边的“象形”、“指事”、“会意”。可是很快就都变成代表声音的符号了。

世界上的文字，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来分类，也就是按照文字代表语言的方式来分类，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音素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又叫做音位）。英语、法语等等所用的拉丁字母（罗马字母），俄语、保加利亚语所用的斯拉夫字母，都是音素文字。第二类是音节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就是辅音和元音的结合体。日语的字母（假名）、阿拉伯语的字母，都属于这一类。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字母原则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是偶然的例外。第三类文字是语素文字，它的单位是字，不是字母，字是有意义的。汉字是这种文字的代表，也是唯一的代表。汉字以外的文字都只是形和音的结合，只有汉字是形、音、义三结合。

这种性质的文字有利也有弊。有利是很明显的，写成文章，印成书，都节省篇幅。还有，因为汉字有表意作用，它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超时间超空间的特点，关于这个，后边还要讲。汉字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难学。为什么难学呢？有四个原因。第一，看见字形读不出字音——秀才不识字念半边，念错的机会和念对的机会一半一半——读不出字音也就不明白字义，得有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第二，笔画多，结构复杂，容易写错。第三，字数多，要学上很多字，一般要学上三四千字，才能读书读报。第四，形音义之间很多交叉关系，容易搞错。有多音多义字，像“行” xíng 和“行” háng，“还” huán 和“还” hái。有一音多义字（指几个意义联系不上的），像“倒”（倒下来，三班倒），“批”（批评，大批）。有一义多音字，像血管的“血”念 xuè，“流血”的“血”念 xiě，“不差什么”的“差”念 chā，差不多的“差”念 chà，这还是合乎规定的一字两读，还有很多不合规定的读音，像“塑（sù）料”念成“朔（shuó）料”，“发酵（jiào）”念成“发孝（xiào）”等等。再举一个例子，有六个字：溜、熘、馏、遛、蹰、雷；三个读音：“liū，liú，liù”，表达八种意义。是这么分配的：

音 义 形		溜 熘 馏 遛 蹰 雷
liū	~ 冰	+
	~ 肝尖	+
liú	逗 ~	+
	蒸 ~	+
liù	~ 馒头	+
	~ 大街 ~ 达	+
	大 ~	+
	檐 ~	+

有这四条，念错字的多，写错字的多，用错字的多，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外国来华的留学生都说，他们的学习时间小一半花在汉语上，多一半花在汉字上。

除了难学，汉字还有一个缺点是难查。曾经被人提出来过的查字法不知有多少种。有人说有一百多种。曾经用来编过字典的少说也有二三十种。从原则上分类：（1）音序类，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列。从前“注音字母”时代有按 b, p, m, f, d, t, n, l……排列的，现在不用了。（2）部首类。老牌是《康熙字典》的 214 部，改良的有《辞海》的部首检字，《新华字典》的部首检字，《现代汉语词典》的部首检字，这三家都对《康熙字典》的部首做了修改，可是不完全相同。（3）笔顺类，不止一种。笔形的数目有多有少，次序也不尽相同。（4）字形编码类。四角号码最有名，也还有别的。除这四种以外还有一种方法，数笔画，主要是用做辅助手段，比如先按部首排，同一部首之内按笔画多少排。除此之外就只用在小范围之内，例如排人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这些都是现代的排列法，从前还有按韵排列的，如《广韵》、《佩文韵府》等等，也是字典性质的书。查字法的多，表明给汉字排次序的困难。跟拼音文字比较，难易相差就太大了。拼音文字只有几十个字母，排一个固定的次序，很容易记住。按说咱们现在也有按汉语拼音排列的音序查字法，可是由于汉字本身不表示语音，遇到不知道读音的字就没法子查，所以音序查字法不能单独用，必得附带别种查字法作为辅助手段。缺少一种简便的查字法，不但是影响语文的学习，还在其他方面产生一系列的困难，回头还要讲到。

三 语言文字的演变

语言文字总是要有变化的，时间短不觉得，时间一长就明显了。先说语文单位的演变，也就是字音、字义、字形的演变。上古时候的事情有许多现在说不清，姑且拿中古时候的情形来跟现在比较。字音是朝着简化的方向变化。古时候的字音，声母不一定比现代多，韵母可比现代多得多。字音简化的结果，许多古时候不同音的字现在变得同音了。例如：致、制、智、质、治、痔，古时候不同音，现在同音了。立、力、历、利、吏、丽、例、栗，古时候不同音，现在同音了。平、瓶、凭，右、幼、诱，换、患、幻，这三组古时候也都不同音。同音字增多的结果是一个字音代表好多个字，表示为数更多的义项，产生超负荷的现象，不利于交际。为了补救，很多单音词（单字）发展成为双音词，例如力气、经历、利益、便利、官吏、美丽等等。

字义的变化是有增有减。拿“级”字做例子，古时候有等级、台级、首级三个义项，现在首级这个意义不用了，却多了个量词的用法。再拿“报”字做例子，古时候有判罪、报答和报复、告知、答复四个义项，现在判罪这个意义不用了，可是从告知的意义产生了报告、报纸、电报的意义，而报答和报复的意义也分开来各用一个双音词来表示。

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从元朝明朝流传下来的通俗文学作品里就有许多简化字现在还在通用，例如：“独”、“桥”、“万”、“权”。五十年代，国务院公布了一批简化字，有原来就有的，有新

造的。繁化的例子如“然”字加“火”成“燃”，“席”字加草头成“蓆”，这是字典里边认可的，安装的“安”写成“按”，包子的“包”写成“饱”，这是字典里边不承认的。

以上讲的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语文单位的演变，也就是从微观方面观察的语文演变。现在再讲语文系统的演变，也就是从宏观方面观察的语文演变。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文言问题，一个是方言问题。什么是文言？文言只是书面上的交际工具，不是口头的交际工具，是只能“目治”不能“耳治”的。这句话不但是适用于现代，大概从秦汉以后就可以这样说。比如《论语》这部书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说话的。《论语》头一卷的头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在孔子当时一定是听得懂的，而现在就得说成“学习并且时常温习，是一种乐趣”之类的话才能懂。这不等于说在孔子的时代，书面语和口语绝对一致。这种情况恐怕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但是在孔子当时，“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念出来是可以懂的。正如现代的英语、法语、俄语等等，尽管有些文字，包括诗，跟日常说话不一样，可是念出来都能懂。当然，这是指受过教育的人说的。可是咱们的文言，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也不能用耳朵听懂，必得用眼睛看才能懂——成语和常被引用的诗句、文句除外。这种“文言”是怎么产生的？这跟汉字的存在分不开。如果一种语言用的是拼音文字，它的书面形式必然要跟着口语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要看不懂。当然，在时间上可以有些距离，但是不能让字音改了而拼法老不改，说话的字眼换了而文字上老不换。汉语的书面形式是汉字，汉字可以离开口语而存在，这就促成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口语改变了而书面语不变或者少变。经典著作的学习，世代相传，就把

“文言”这种书面语基本上固定下来。说“基本上”，是因为除正规的文言外也还有些受口语影响、不太正规的文言存在。到了晚唐五代，开始出现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用于通俗文学；到宋元以后，这种“白话”越来越成熟，差不多能代表口语，但是直到本世纪初，白话的用途一直局限于通俗文学，除此之外仍然是文言的天下。

再说方言问题。古代有没有方言？一定是有的。汉朝扬雄编过一本《方言》，说明汉朝方言词汇分歧的情况。词汇有分歧，语音也不会没有分歧；汉朝有方言，汉朝以前也不会没有方言。春秋战国时代有跟“方言”相对的“雅言”，那大概是一种跟后世的“官话”相类似的口语，是通行于各诸侯国之间的上层人士的语言，同时也就是后世“文言”的底子。这种雅言或官话想来秦汉以后也应该是一直存在的。按照一般通例，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种为全民共同使用的口语逐渐取得对方言的优势。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封建阶段，也就迟迟未能以某种形式的官话为基础形成全民共同的口语。这期间，用汉字为其表现形式的“文言”能够在各个方言区通行，这一事实对于共同口语的形成也起了消极的阻滞作用。

四 语文改革运动

一方面有不受时代拘束、不受地区限制的，也就是“超时空”的文言，一方面有活跃在各个地区的方言，这二者互相配合，满足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语言生活的需要。这是有条件的，条件是全国只有地主阶级及其附庸阶层，也许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有足够的时间和其他条件学习那艰

难的文言，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只会说话，不会读书，不会写文字，其中也许有少数人认识不多的字，可以写个简单的信，记个简单的账。封建社会不变，这种情况不会变，也没有变的需要。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帝国主义来叩中国的大门，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出了积极的反应。经过几十年，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认识到，欧美日本等国家的胜过中国，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还在于文化教育的普及。他们也认识到，在文言加方言的局面之下是很难普及文化教育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了语文改革运动。这个语文改革运动有三个组成部分：针对言文不一致，有白话文运动；针对方言分歧，有国语运动；针对汉字难学难用，有拼音字运动。赞成其中某一部分的，往往（但不是必然）也赞成其余的部分。

白话文运动最初是包含在拼音字运动里边的，拼音字不可能以文言为拼写的对象。至于撇开拼音字，大张旗鼓地提倡白话文，把白话文引进到中小学课程里去，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事情。同时，在文艺创作上，由于有白话小说的传统，白话很快就占领了全部阵地。在应用文方面，三十年代白话就在共产党统治区取得胜利，又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推行到全国。以现在而论，作为汉语的书面语，白话已经完全取代了文言。但是在某些文体里，例如法律文书和考据文章，文言的成分还是相当的多。有些作家的文艺散文里也出现不少文言词语。社会上还流行一种意见，说是要写好白话文，得先学好文言文，有些中学老师也有这种主张。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要在白话文里边使用文言词语（当然是指那些还没有归化的），能够做到“化”在里边而不是“镶”在上

面，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非常容易弄巧成拙，文白夹杂，引起读者的反感。我曾经在一个学校的纪念册上题过两句话：“做人要做现代人，作文要作现代文”。其实白话的潜力是很大的，咱们应当努力耕种白话的田地，不要图省事老向文言伸手。

国语运动和拼音字运动的关系始终是很密切的。国语运动的最早的形式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它的任务是制定一套给汉字注音的字母，这就是1913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后来又经过修改）。读音统一会演变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后来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在军阀官僚统治下，这项工作没能取得应该可以取得的效果。解放后不说“国语”，改称“普通话”。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在五十年代后期成绩显著，可惜在三年困难时期松了劲，到了十年动乱时期更不用说了。现在“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已经写进宪法，有关方面也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但是要达到全国的中青年都能说普通话，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前面说有些人写文章大量使用文言词语，这跟普通话不普及也有关系。你想呢，一个人既不熟悉普通话语汇，又不便搬弄他的方言词语，自然只好向文言求救了。可见为了写好白话文也应当认真学习普通话。

拼音字运动是个总的名称，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就是要有一套拼音字母。至于要这套字母做什么用，就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拿来给汉字注音。一种意见是拿来拼写口语，这里边又可以分为只拼官话和也拼方言，但都是作为一种初级文字，与汉字分工并用。第三种意见就是要用拼音字来代替汉字。清朝末年的拼音字运动者都不主张废除汉字，但是都主张要有一种学起来容易、用起来方便的拼音文

字，与汉字并行，不仅仅是要求有一套给汉字注音的工具。民国以后，占优势的，并且为官方所承认的，是为汉字注音的一派，他们的成绩就是前面说过的注音字母。可是五四运动之后，用拼音字代替汉字的主张也还是不断地出现。1923年出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里边就有钱玄同等人写文章鼓吹用拼音字代替汉字。至于具体方案，则先有赵元任、黎锦熙等人研究制定的“国语罗马字”（1926），后有吴玉章、林伯渠和一部分苏联学者研究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1931），后者一度在左派阵营和解放区推行。解放后，设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广泛地用于汉字注音。汉语拼音方案为拼音文字提供了一个基础。但是虽然毛主席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话，拼音文字目前还处于研究和试用阶段。尽管是这样，汉语拼音方案的用处还是很大的，现在还远远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有一个虽然不在语文改革的主流之内，可是目前相当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汉字规范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自有汉字以来就是一个字往往有几种写法。后来分别“正体”和“俗字”，后者多数是简化字。简化字的产生是由于实际的需要，因为有很多汉字实在笔画太多，结构太复杂。缺点是：一、繁体简体并用，增加学习的负担；二、往往一个字有不只一种简化体；三、有些需要简化的字没有现成的简化体。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简化字，规定凡是跟这些简化字相应的繁体字不再在一般场合使用；同时，在公布的简化字表以外的简化字不得作为正式字体使用。这个规定有二十多年一直得到遵守。1977年公布了第二批简化字试用草案，由于社会上反应不好，试用半年之后就停止试用，但